

THE BEST SELLERS OF THE WORLD

世界金榜畅销译林

龙虎榜

五号屠场

远方出版社

世界金榜畅销译林

五号屠场

[美] ~~厄~~ 索特·冯·尼格
彭利佳 译



牲口哞哞叫，
圣婴惊醒了。
但小主基督，
不哭也不闹。

下面的这一切基本上是实情，至少是有关战争的部分。我认识的一个人因为拿了别人的茶壶而真的在德累斯顿被枪毙了。我熟悉的另一个家伙确实发过誓，说战争结束后他要雇一批人来干掉他的仇人。如此等等。但是这部小说里我都化去了他们的真名。

我确实于一九六七年用古根海姆基金给我的钱（真呱呱叫）再次去过德累斯顿。这地方很像俄亥俄州的戴顿城，比戴顿城还空旷。那儿地下埋藏的尸骨成千上万。

我是与我的老战友伯纳德·弗·奥黑尔一起重返德累斯顿的。我们与出租汽车司机交上了朋友，他驱车送我们去屠场，我们当战俘时就被关在那里。司机名叫格哈特·缪勒尔。据他说他一度被美国人俘虏了。我们问他在共产党领导下生活怎么样，他说开始时可怕，因为每个人都得努力工作，而且衣、食、住都不够。但目前情况好得多了。他已有的公寓房间舒适极了，他的女儿也受到很好的教育，他的母亲已在德累斯顿大火中化为灰烬。就这么回事。缪勒尔于圣诞节寄给奥黑尔一张明信片，上面写着：

“祝你的家人和朋友圣诞节愉快，新年快乐，并希望能有机会，有一天能在和平、自由世界里的出租汽车中再见。”

我很喜欢“好有机会有一天”的说法。



我真不想告诉你们这本小说花费了我多少金钱，多少心血和时间。二十三年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我回到家里，当时我认为写德累斯顿的毁灭是那么简单轻易的，只需报道我目睹的那些情况就行了；而且我还认为这部作品一定会成为名著，或者至少可以捞一大笔钱，因为这书的题目很大。

不过当时关于德累斯顿并没有多少要写的东西——横竖不够写一本书。就是现在，儿子已经成人，我已是一个饱经风霜，萦怀往事，爱抽帕玛牌香烟的老头儿了，却依然没有多少要写的东西。虽然我感到回忆德累斯顿的往事毫无用处，但它却引诱着我非把它写出来不可，这使我想起了那有名的打油诗：

一个来自斯坦波尔的青年，
对着他的工具自言自语：
“我所有的钱财都花在了你上面，
又把我的健康毁坏，
如今你屁用没有，你这个老蠢才。”

而且它还使我想起了一首歌，是这样唱的：

在下名叫雍永森，
工作地点在威斯康星，
工作单位是木材厂。
有时走在路上遇上了什么人，
他们问我：“请问尊姓大名？”
我便回答他说道：
“在下名叫雍永森，
工作地点在威斯康星……”
就是这样，反反复复。

多年来，见到我的人常问我在写什么，我总是回答说，主要是写一本关于德累斯顿的书。



一次我对电影制片人哈里森·斯塔尔说这话时，他耸肩扬眉问道：“是一本反战作品吗？”

“我想是的。”我说。

“当我听说有人写反战作品时，我会跟他们说什么？”

“不知道。你说啥，哈里森·斯塔尔？”

“我说呀，与其写反战作品，何不写反冰河的作品？”

他的意思很明显：战争总会有的，反对战争就像拦截冰河一样，谈何容易。我也这样想。

即使战争不像冰河那样不停地涌来，人总还是要死的。

前两年，当我着手写这本关于德累斯顿的名著时，我想打电话给老战友伯纳德·弗·奥黑尔，想看看我是否可以去看他。他那时是宾夕法尼亚的地方检察官，而我是住在科德角的一个作家。我们在部队里当过兵，是步兵侦察兵。我们从没指望战争后能成有钱人，但是我们生活得很好。

我让贝尔电话公司找他，贝尔电话公司极有门路，设法找到了他。有时在深夜我会发病，发病时就想喝酒和打电话。我喝醉酒，散发着玫瑰花和芥子气的味儿，便把妻子熏跑。然后我就庄重而文雅地拿起电话筒，请电话员帮我跟久违的哪个朋友接通线路。

就这样我与奥黑尔通了电话。他身材矮小，而我个儿高大。战争期间我们是亲密的伙伴，我们曾同时被捕。我在电话里说明我是谁，他马上就听出了是我。他还没有上床，正在看书，他家里的人却都睡着了。

“听我讲——”我说，“我正在写那本关于德累斯顿的书。我希望有人帮我回忆一些事情。我可以去看你吗，我们可以一块儿喝酒，聊天，回忆。”

他的反应并不热烈。他说他记的事情不多，但是还是答应了。

“我认为处死可怜的老埃德加·德比是全书的高潮，”我说，



“这是极大的讽刺。整个城市化为灰烬，成千上万的人被杀害。就在这时候一个美国士兵只因为废墟中拿了一只茶壶而被抓了起来。他受到一般的审讯后，就被行刑队枪毙了。”

“嗯。”奥黑尔说。

“你不认为这件事能成为我写书的高潮吗？”

“这个问题我一窍不通，”他说，“你懂这一行，我可不懂。”我确实靠贩卖高潮、惊险的情节、人物素描和精彩独特的对话来维持生活，我曾多次拟过德累斯顿故事的写作提纲。当中最好的，或者说最美的部分是写在一卷糊墙纸的背后。

这份提纲是用我女儿的颜色笔画的，一种颜色代表一个主要人物。糊墙纸的一端是故事的开头，另一端是结尾，中间空白是故事的经过。蓝线碰到红线然后碰到黄线，黄线突然中止，因为黄线代表的那个人物死掉了。如此等等。德累斯顿的毁灭是用橙色的井字形垂直线条表示的，凡通过它而幸存的线条就显露在纸的另一侧。

这些线条停止的终点是哈雷市外易北河岸的一片甜菜地。天正下着雨。欧洲战争已结束两个星期了。我们——英国人、美国人、荷兰人、比利时人、法国人、加拿大人、南非人、新西兰人和澳大利亚人——全都列队站在那儿，由俄国士兵看守着，即将解放我们成千上万的战俘。

在甜菜地的另一边是成千上万的俄国人、波兰人、南斯拉夫人等等，由美国士兵守卫。在雨中进行了战俘交换——一人换一人。奥黑尔和我与其他许多人爬上一辆美国大卡车的后面。奥黑尔没捞到什么战利品。其他人几乎都有。我的战利品是德国空军使用的一把正规马刀，保存在身边至今天。我在本书中称之为保罗·拉扎罗的那个发狂的小个子美国人大约有一夸脱钻石、绿宝石、红宝石等等。这些东西是他从德累斯顿地窖里死人身上取下来的。就这么



回事。

一个英国人傻头傻脑，牙掉光了，把他的战利品全收在一只帆布背包里。这只背包就放在我的脚背上。他不时地眯着眼睛看看背包，并扭着他细而瘦的脖子，转动眼珠，想发现有谁向他的背包投来贪婪的目光。还用布包拍我脚面。

我以为他是无意的。但是我错了。他总得向谁显示一下他背包里的东西，而他认为我是可以信任的。他与我的目光相遇，眨眨眼，打开了背包。其中有巴黎铁塔的石膏模型，上面涂了金，一只钟在里面摆着。

“这玩艺儿真好。”他说。

飞机把我们送到法国的休养营地，那儿的巧克力、麦酒、冷冻牛奶及其它富有营养的食物使我们又白又胖。然后我们被遣送回国，我还要了一个漂亮姑娘，她也养得像个胖娃娃。我们还有了小孩。

他们现在都长大了，我也成了一个爱怀旧，爱抽帕玛牌香烟的老头。在下叫雍永森，工作地点在威斯康星，工作单位是木材厂。

有时在深夜里，我妻子上床后，我想打电话给我从前的女朋友。“电话员，你能告诉我某某太太的电话号码吗？我想她住在什么地方。”

“先生，对不起。名单上没有。”

“谢谢，电话员。没关系的，谢谢。”

于是我放出狗，或者说放狗进来，谈上几句。我让它知道我喜欢它，它也让我知道它喜欢我。它对玫瑰花和芥子气的臭味并不介意。

“你很好，桑迪，”我想对狗说，“你不知道吧？你蛮好。”有时我打开无线电收听波士顿或纽约的谈话节目。假如我们喝了好多的酒，录制的音乐会使我讨厌。



我或迟或早地上床,妻子便问我已经什么时候了。她总是想知道时间。有时我不知道,就说:“不太清楚。”

也有时我想到所受的教育。二次大战后我一度上过芝加哥大学,是人类学系的学生。那时他们教我们,说人与人之间没有什么绝对的不同。他们现在可能还用这套来教。

他们还教导说,可笑的人、讨厌的人。坏人或荒谬的人是没的。我父亲去世前不久对我说:“你知道,你写的小说全没有坏蛋。”

我告诉他,这是战后在大学里得到的一个道理。

我为了成为人类学家一面在校学习,一面在外边兼职,每周挣二十八美元。我担任了著名的芝加哥市新闻局的警察通讯员。一次,他们把我从夜班调到日班,我连续十六个小时未休息。我们受到该城所有报纸的支持,如美联社、合众社等等。我们报道法庭、警察局、消防局、密执安湖沿岸救生查缉队等有关情况。我们通过芝加哥地下气压传信管与那些支持我们的机构没有断了联系。

通讯员在电话里把报道告诉戴着耳机的记录员,记录员便把它打在蜡纸上。经过油印,这些报道便被塞进铜和绒制成的筒子里,这些筒子又被气管所吞没。妇女是最厉害的通讯员和记录员,她们顶替了去前方的男人的工作。

我的第一篇报道就是在电话里讲给这么一个厉害女人听的。报道的是一个年轻的退伍军人。他有了工作,在一座办公大楼里开老式电梯。一楼通电梯的门上有铁的饰边。铁制的常春藤在孔洞里穿进穿出,一根铁的枝条上栖息着两只铁制的情鸟。这位退伍军人打算把电梯开往地下室,他关起门来往下开,但是他的结婚戒指钩在了门口的饰边上。他被挂在空中,而电梯继续往下降,于是电梯的顶棚把他砸得稀烂。就这么回事。

我在电梯里汇报了这个情况,准备打蜡纸的那个女人问我:
“他妻子反映如何?”



“她还不知道哩，”我说，“事情刚发生。”

“给她打个电话，看她说什么。”

“什么？”

“告诉她你是警察局的费恩上尉。说有不幸的消息。把这事告诉她，看她怎么反映。”

我照办了。她说什么是可想而知的。有个婴儿，如此等等。我回办公室后，那女记录员本人想了解情况，又问我那家伙被砸烂时是什么样子。

我跟她讲述了一遍。

“你感到恶心吗？”她问。她正吃着三个火枪手牌的棒棒糖。“哦，不，南希，”我说，“战争期比这还惨的事很多。”

那时人们就认为我在写一本关于德累斯顿的书了。当时美国不大知道这次空袭。没有几个美国人知道它比——譬如说广岛的轰炸还厉害得多。连我也不知道。这件事没有被大肆宣扬。在一次鸡尾酒会上，我偶尔向芝加哥大学的一位教授谈到我所看到的这次空袭，谈到我要写的这本书。他是一个称之为“社会思想委员会”之类组织的会员。他向我讲述集中营的情况，谈起德国人用犹太死人身上的脂肪制造肥皂和蜡烛等等。

我能说的是：“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第二次世界大战确实让任何人都比原来刻苦。我成了纽约州斯克内克塔迪通用电气公司的对外宣传联络员，并自告奋勇地担任了阿尔普劳斯村的消防队员，我在那儿买下了我的第一所住宅。公司的老板是我渴望见到的一个最刻苦的人。他曾担任巴尔的摩海军对外宣传联络中校。我在斯克内克塔迪时，他加入了荷兰改革教会，那的确是个严格的教会。

有时他常嘲笑地问我为什么没当上军官，就像我做了什么事一样。



我妻子和我都瘦了。这是我们的“清瘦之年”。我的朋友中的许多退伍军人和他们的妻子也都变得比原来瘦了。我认为,斯克内克塔迪最好的退伍军人,最善良、最有趣、最憎恶战争的退伍军人是真正打过仗的军人。

那时我就曾写信给空军,询问德累斯顿空袭的详情:谁下的命令,是多少架飞机干的,为何这么干,想取得什么样的结果等等。答复我的人与我一样,是负责搞对外宣传联络工作的。他说他很抱歉,这些情况仍属绝密。

我大声朗读来信给妻子听,并说:“保密?天哪,向谁保密?”当时我们是世界联邦分子。我不知道我们现在是什么人。我想,是电话员吧。我们打电话很多——至少我打得很多,而且在深夜。

在我与老战友伯纳德·弗·奥黑尔打过电话两周后的一天,我真的跑去看他了。那大约是一九六四年——总之头一年举行了纽约世界博览会。呵,光阴似箭。在下名叫雍永森,一个来自斯坦波尔的青年。

与我同往的是两个女孩子:我的女儿南尼和她最要好的朋友艾莉逊·米切尔。她们从未离开过科德角。我们看见了一条河,便得停下来,这样,她们能够欣赏一会儿河边景色。她们从未见过这种不含盐份、河床狭窄的流水。这是哈德逊河。河里有鲤鱼,我们能看得见。它们挺大,像核潜艇。

我们还看到了瀑布,那是些溪流,从崖而降,注入特拉华河。要停下来看的东西很多——然后又该往前走,总得催她们走。小姑娘们穿着舞会上穿的白色礼服和黑鞋子,因此陌生人一眼就看出她们多么可爱。“姑娘们,该走了。”我偶尔地提醒她们道。于是我们又往前走。

后来太阳下山了,我们在一家意大利餐馆里吃了晚饭,然后我便去敲伯纳德·弗·奥黑尔家漂亮的石砌房子的大门。我带着一



瓶爱尔兰威士忌，那瓶子就像吃饭时摇的铃子。

我会见了他的贤妻玛丽，这本书就是奉献给她的。还奉献给德累斯顿的出租汽车司机格哈特·缪勒尔。玛丽·奥黑尔是位训练有素的护士，护士是妇女的适合工作。

玛丽很赞赏我带去的两个小女孩，让她们与她自己的女孩一起玩，一起去楼上嬉戏、看电视。等孩子们走后，我才意识到玛丽不喜欢我，也许对这个夜晚感到不快。她的态度客气而冷淡。

“你们的房子很好，很舒适。”我说，这房子真是呱呱叫的。

“我安排了个地方，你们可以在那里聊聊，不会受干扰。”她说。

“好。”我说，我想象一间隔板套间的火炉前摆着两张皮椅子，两个老兵可以坐在那儿喝酒聊天。但是她却把我们领到厨房。她放了两张直靠背椅在铺着白瓷桌面的餐桌旁。头顶上一只两百瓦灯泡的光线照射在桌面上，令人眼花缭乱。玛丽似乎为我们准备了一间手术室。她在桌子上只放了一只杯子，是专给我用的。她解释说，战争结束后，奥黑尔就再享受不了烈性酒了。

于是我们坐了下来。奥黑尔很窘，但是他不肯告诉我出了什么事情。我也没想到是我惹得玛丽如此恼火。我是个有家室的人。我只结过一次婚。我不是醉鬼。战争期间我也没去把她丈夫陷害了。

她给自己调了一杯可口可乐，盛冰砖的盘子碰到洁白的不锈钢水池上，发出很大的声响。然后她又走到别的房间去。但是她坐立不安，满屋子转来转去，开了门又关上了，甚至把家具搬来搬去，以此来发泄心中的怒火。

我问奥黑尔，我说了或做了什么，使她这么不高兴。

“没什么，”他说，“你别烦心。这与你不相干。”他一片好心，他在扯谎。这跟我很有关系。

我们决定不理玛丽而回忆战争。我拿出随身带来的两瓶酒。我



们有时哈哈大笑，有时又微微一笑，好像又回想到了战时情景，但是我们谁也回忆不起什么好事。奥黑尔想起在德累斯顿挨炸之前，有一个家伙喝得烂醉，我们只好用手推车把他送回去。这件事也不值得写本书。我回想起有两个俄国士兵抢劫一个钟表厂。他们拉了满满一马车的钟。他们兴高采烈，酩酊大醉，抽着用报纸卷的粗大香烟。

我们回忆起来的大致就这些，而玛丽仍然在弄出各种响声。她最后又到厨房里来调可口可乐。她从冰箱里又拿出一盘冰砖，把它砰的一声丢进水池，虽然那里面已经扔了不少冰块了。然后她转向我，让我知道她多么生气，而已是跟我生气了。她一直在自言自语，我只听到了她的片言只语：“那时候你们不过是娃娃！”

“什么？”我问。

“打仗的时候你们不过是娃娃——就像楼上的那些娃娃！”

我点头承认。战争期间我们是傻头傻脑、天真烂漫的孩子，我们的童年时代刚刚结束。

“但是你不准备那么写，是吧。”这是责备的问话。

“我——我不知道。”我说。

“噢，我知道，”她说，“你会假装你是成年人而不是娃娃，然后弗兰克·西纳特拉和约翰·韦恩或别的富有魅力的明星、好战的脏老头会在电影中扮演你们的角色。于是战争看起来简直妙不可言，所以我们还会有更多的战争。而打仗的将是像在楼上玩的那样的娃娃。”

这时我才恍然大悟，是战争使她如此气恼。她不愿让任何人的娃娃死在战争里。她认为书本和电影对鼓动战争负有部分责任。

10

因此我举起右手向她保证：“玛丽，”我说，“我并不认为我能完成这本书。五千页写好后我会再搁下来的。如果我真的会写完这本书，我可以向你保证：书中决没有弗兰克·西纳特拉或约翰·韦恩



可以扮演的角色。”

“告诉你吧，”我说，“我要把这本书叫做《儿童十字军》。”这次谈话之后她成了我的朋友。

奥黑尔和我停止了回忆，来到起居室，谈论别的事情。我们很想知道真正的儿童十字军到底是怎样的，因此奥黑尔便翻阅他的一本书，法学博士查理·麦凯所著《异常流行的欺骗和大众的狂热》，一八四一年初版。

麦凯对所有的十字军都有很不好的评价，他却感到一次儿童十字军比十次成年人十字军其卑鄙程度不小多少。奥黑尔大声朗读下面这段佳作：

历史以其庄严的篇章告诉我们，十字军参加者都很野蛮，他们的动机纯粹是执拗和偏见，他们的道路布满了血和泪。但另一方面，传奇文学却夸大了他们的虔诚和英雄主义，用最热烈而激情的色调描绘他们的美德和高尚行为，描绘他们为自己赢得的不朽荣誉和为基督教作出的伟大贡献。

然后奥黑尔又朗读下面一段：那么战争的收获是什么呢？欧洲耗尽了数以万计的人和物力，而一小撮争吵不休的骑士却占据巴勒斯坦百年之久！

麦凯告诉我们，儿童十字军始于一二一三年，当时两个僧侣想在德国和法国招募儿童军，然后在北非他们被卖为奴隶。有三万名儿童自愿参军，他们以为是去巴勒斯坦。麦凯说，他们无疑是些被遗弃的、懒惰的儿童，在各大城市充斥着，沾染了各种恶习，胆大妄为，肆无忌惮。

教皇伊诺森三世也认为他们是去巴勒斯坦的，他激动地说：“当我们沉睡时，孩子都清醒着。”

用船把大部分孩子运出马赛港，其中大约半数在船只失事时淹死。另一半到达北非后被贩卖了。



有的儿童错误地到热那亚去报到，那儿并没有贩奴船来接他们，却有些好心人供给他们吃住，和蔼地询问他们，然后给了他们少量的钱和大量的劝告，把他们送回家。

“热那亚的那些好心人心肠真好呀！”玛丽·奥黑尔说。

那天晚上我睡在一间婴儿卧室里。奥黑尔在我的床头桌上放了一本书。这是玛丽·恩德尔写的《德累斯顿，历史，舞台和画廊》，此书于一九〇八年出版，前言是这样写的：

我希望这本小书对读者有所帮助。本书企图使英语读者概括了解德累斯顿在建筑上如何发展到今天的水平；在音乐上，由于几个人的天才，如何达到如今的盛况；本书还着重指出艺术上几个永恒的里程碑使该城的画廊经常吸引画家到这里来寻求隽永的印象。

再往下我读到以下的历史：

如今，一七六〇年，普鲁士人围攻了德累斯顿。七月十五日开始炮击。美术陈列室着火。许多名画被运往柯尼施泰因，但有些已被炸弹碎片严重损坏——特别是弗朗西亚的《基督的洗礼》。而后，庄严的十字架教堂的塔楼——月夜观察敌人动静的瞭望哨，吞没在大火里。这座教堂后来屈服了。与十字架教堂的可怜的命运相反，圣母院的圆顶虽然遭到普鲁士炸弹阵雨般的袭击，弗里德里克最后被迫停止围攻，因为听说他所征服的要地格拉茨危急。“为了不致于把一切失去，我们必须到西里西亚去。”德累斯顿遭到惨重的破坏。当学生时代的哥德访问该城的时候，他还能看出那一块块糟透了的废墟而感慨说道：“从圣母院的圆顶上我看到散布在这井井有条的城市中心的一块块讨厌的废墟，圣母院看守人在一旁向我称赞建筑师的本领，他说已想到这情况会令人不快，把圣母院和圆顶造得坚不可摧。然后这位善良的看守人把四面八方的废墟指给我看，沉思地、言简意赅地说：“是敌人干的！”



次日清晨，我和两个小女孩在华盛顿当年渡过特拉华河的地方过了河。我们到了纽约世界博览会，看见了福特汽车公司和沃尔特·迪斯尼所设想的过去情况，并看见了按通用汽车公司设想的未来世界。关于现在，我自发问：它有多宽、有多深，我有多少东西能留存。后来，我在衣阿华大学著名的创作讲习班开了两年创作课。我陷入了非常可爱的麻烦，没多久就脱了身。我下午教课，上午写作，谁也不准来打扰。我当时在写德累斯顿那部名著。

大约就在那时，一位叫西摩·劳伦斯的好人让我签一份写三本书的合同，我说：“好，三本书的第一本是我的那本名著德累斯顿。”朋友们都叫西摩·劳伦斯为“山姆”。我现在对山姆说：“山姆——给你书。”

山姆，这本书又短又杂乱，因为关于大屠杀没有什么聪明话好说。人们设想大家都死去，不会再发表什么议论与提要求了。人们设想大屠杀之后非常寂静，实际上也的确如此，只有鸟儿除外。鸟儿又说些什么呢？难道对大屠杀就叫叫“普一蒂一威特”之类算完了吗？

我曾告诉我的儿子，无论如何不能去参与大屠杀，听到屠杀敌人不应当感到得意和高兴。

我还告诉他们不要为制造屠杀机器的公司工作，对认为需要这种机器的人应该蔑视他们。

如我所说，我最近曾与友人奥黑尔重返德累斯顿。我们在汉堡、东柏林、西柏林、维也纳、萨尔茨堡和赫尔辛基过着愉快的生活，在列宁格勒也一样。这对我很有好处，因为我看到了为今后我要写的小说构思故事的种种可靠背景材料。其中之一将称之为“俄罗斯的奇异风格”，另一个将是“禁止接吻”，还有“金元大棒”，“假如偶尔有机会的话”，如此等等。

如此等等。



有一架西德汉莎航空公司的飞机由费城飞经波士顿，再飞往法兰克福。奥黑尔打算在费城上飞机，我准备在波士顿乘飞机去。我们于是离开了。但是波士顿有大雾，没有通话联系，飞机只能从费城一直飞往法兰克福。我在波士顿无所事事，汉莎航空公司把我和其他几个无所事事的人用小汽车送往旅馆，熬过了无事可做的一晚。

时间无法消磨。有人玩弄时钟，不仅玩弄电动钟，而且玩弄发条钟。我手表上的秒针颤动一下就算一年，然后再颤动又算一年。

我完全不能这么做。作为世界芸芸众生里的一员，我只能相信时钟和年历。

我带了两本书，准备在飞机上看的。一本是西奥多·罗斯克的《咏风词》，其中有这样的诗句：

我慢悠悠地醒来，醒而复睡。

于无畏时知命，于不得不去处知情。

另一本书是艾丽卡·奥斯特洛夫斯基所著的《赛林纳和他的梦幻》。赛林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是一名勇敢的法国士兵——后来他的头盖骨震裂了。打那以后他便无法入睡，而且老听到脑袋里嗡嗡的声音。后来他当了医生，白天给穷人看病，晚上则通宵写怪诞小说。他写道：没有与死亡跳过舞，就不可能有艺术。

真理就是死去，他写道，我已尽可能地与它进行过恰当的斗争……与它跳舞，给它饰以彩灯，与它跳华尔兹圆舞……给它披上彩带，使它愉快……

时间烦扰着他。奥斯特洛夫斯基小姐使我想起“按分期付款的办法购买死亡”中的奇异情景，赛林纳想要止住街上人群的喧闹，他在纸上大声疾呼：让他们停下来……要让他们一动不动了……喂，让他们站住不动……永远地！……这样他们就再也不会消失了！



我在旅馆房间里翻阅基甸圣经,找关于大毁灭的故事。日头出来后,罗得到了琐珥。当时上帝将硫磺与火,从天上降到所多玛和蛾摩拉,把那些城和全平原,并城里所有的居民,连地上生长的,全部毁灭尽了。

就这么回事。

大家都知道,这两个城里住的都是坏人,如果他们不存在,世界能够好点。

罗得的妻子被劝告不得回头看这些人的家乡。但是她却回头看啦,在我这一点真的太可爱了,因为这是非常合乎人情的。她为此被化为一根盐柱子。就这么回事。

人们不许回头向后看,我以后一定不再向后看了。

现在我已经把我们这本关于战争的书写完了,下次可要写一本有趣味的书啦。

这本书是一个失败,而且不能不如此,因为它是由盐柱子写的。书是这样开头的:

听:

毕利·皮尔格里姆挣脱了时间的羁绊。

书是这样结尾的:

普—蒂—威特?

听:

毕利·皮尔格里姆挣脱了时间的羁绊。

他睡去的时候还是个衰老的鳏夫,醒来时却正举行婚礼。他在一九五五年的门进去,却从另一个门一九四一年出来。他再从这个门回去,却发现自己在一九六三年。他说他多次看见自己的诞生和去世,为所欲为地回到他的生与死之间的一切事件中去。

他是这么说的。

毕利在时间上患了痉挛症,无法控制他下一步往哪儿去,而且